

KECHENG
WENHUA ZIBEN YANJIU

课程文化资本研究

罗生全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国际比较与本土理论建构研究》(SWU1709117)

KECHENG
WENHUA ZIBEN YANJIU

课程文化资本研究

罗生全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课程文化资本研究 / 罗生全著.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21-8395-2

I. ①课… II. ①罗… III. ①课程—教学研究 IV. ①G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9668 号

课程文化资本研究

罗生全 著

责任编辑:段小佳

装帧设计:魏显峰 谭 玺

排 版: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瞿 勤

出版发行: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址:<http://www.xscbs.com>

地址: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 2 号

市场营销部电话:023-68868624

邮编:400715

印 刷:重庆紫石东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

字 数:29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6 月 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21-8395-2

定 价:52.00 元

目录

CONTENTS

绪论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2

二、立论基础/6

(一)文化社会学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6

(二)新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及其相关理论/8

三、本书的逻辑理路与研究方法/14

第一章

课程作为文化资本的意蕴解读/17

一、课程文化资本概念辨析/18

(一)课程及课程文化的历史考察/19

(二)文化资本的内涵/23

(三)课程文化资本的内涵/32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特性/36

(一)课程文化资本的虚拟性与依附性/36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不可替代性/37

(三)课程文化资本的可共享性或非排他性/38

(四)课程文化资本的发展性/39

(五)课程文化资本的可转换性/40

(六)课程文化资本的合法性/41

三、课程文化资本的形式/41

- (一)课程文化资本的具体化形式/41
-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客体化形式/42
- (三)课程文化资本的体制化形式/43

四、课程文化资本的积累/44

- (一)课程文化资本积累的独特性/45
-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积累机制/46

第二章 课程文化资本的符号权力本质及其实现逻辑/51

一、符号权力/52

- (一)符号权力的内涵/53
- (二)符号权力的合法化根据/55
- (三)符号权力与意识形态/56

二、课程文化资本与符号权力/57

- (一)课程文化资本的符号权力逻辑/58
-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符号权力效力/59
- (三)课程文化资本符号权力实现的合法化保障/63

三、符号权力与意识形态合谋下的课程文化资本/65

- (一)意识形态是课程文化资本符号权力实现的基础/68
- (二)意识形态促进了课程文化资本合法性的获得/69
- (三)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兑换促进了意识形态和符号权力的有机结合/70

第三章 课程文化资本生产的权力斗争/73

一、课程文化资本生产的动因及其特性/74

- (一)课程文化资本生产的文化品性/75
- (二)课程文化资本生产的权力动因/79

二、课程文化资本生产的权力作用逻辑/84

(一)课程文化资本生产场域中的权力作用特征/84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生产机制/93

(三)课程文化资本生产的标准/97

第四章 课程文化资本流通的制度合法化/103

一、课程文化资本流通的可能性与动因/104

二、课程文化资本流通的形态/107

三、课程文化资本产品流通的制度化逻辑/109

(一)课程文化资本体制化下的课程权力结构/111

(二)课程文化资本流通中的权力争斗/115

(三)权力结构演变下的课程文化资本流通模式/124

第五章 课程文化资本获取的文化控制/127

一、课程文化资本的消费主体/128

(一)教师是主流阶级的知识代言人与委托的权威践行者/129

(二)文化资本差异而彰显的消费主体的等级地位/136

二、课程文化资本消费过程中符号权力的实现形式及其结果/141

(一)适应与获取合法化的以语言为核心建构的符号系统/142

(二)家庭文化资本差异助推了学生获取课程文化资本的差异/148

(三)课堂是课程文化资本实行符号控制的核心场域/156

第六章 课程文化资本的度量/163

一、课程文化资本度量的价值属性/164

(一)课程文化资本度量的价值转型/165

(二)课程文化资本度量的价值表征/172

二、课程文化资本度量体系的建构及其符号权力体现/174

(一)课程文化资本的度量体系/174

(二)课程文化资本的度量过程及其符号权力的实现/177

(三)课程文化资本的度量手段及其符号权力的实现/181

第七章 课程文化资本的反思性实践/189

一、课程理论建构的自我完善/190

二、走向反思性实践的课程文化资本/198

(一)课程文化资本反思性实践的逻辑理路/198

(二)课程理论建构的本土路向/201

(三)课程实践的公平关照/205

结束语/214

参考文献/216

绪 论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绪论	2
第三章 绪论	3
第四章 绪论	4
第五章 绪论	5
第六章 绪论	6
第七章 绪论	7
第八章 绪论	8
第九章 绪论	9
第十章 绪论	10
第十一章 绪论	11
第十二章 绪论	12
第十三章 绪论	13
第十四章 绪论	14
第十五章 绪论	15
第十六章 绪论	16
第十七章 绪论	17
第十八章 绪论	18
第十九章 绪论	19
第二十章 绪论	20
第二十一章 绪论	21
第二十二章 绪论	22
第二十三章 绪论	23
第二十四章 绪论	24
第二十五章 绪论	25
第二十六章 绪论	26
第二十七章 绪论	27
第二十八章 绪论	28
第二十九章 绪论	29
第三十章 绪论	30
第三十一章 绪论	31
第三十二章 绪论	32
第三十三章 绪论	33
第三十四章 绪论	34
第三十五章 绪论	35
第三十六章 绪论	36
第三十七章 绪论	37
第三十八章 绪论	38
第三十九章 绪论	39
第四十章 绪论	40
第四十一章 绪论	41
第四十二章 绪论	42
第四十三章 绪论	43
第四十四章 绪论	44
第四十五章 绪论	45
第四十六章 绪论	46
第四十七章 绪论	47
第四十八章 绪论	48
第四十九章 绪论	49
第五十章 绪论	50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与学生学习的对象,课程改革是历次教育的中心地带,课程研究也理应成为教育研究的核心。新课程改革以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抑或是学者自身的研究需要,课程研究成为近年来涉及面非常广和研究程度非常高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但就研究性质而言,它们多属操作性的研究,如课程计划、课程标准、课程管理、课程编制等,也即注重技术层面上的研究,很少探讨课程的基本理论问题;就研究方式而言,多属历史的、叙述的(Descriptive)研究,缺少解释的(Interpretive)、文化的课程方法论的探讨;就研究内容而言,多属课程实际问题或课程行政的探讨,而忽视课程实质或教材内容的分析。^① 这种现象一方面由于课程改革的政府行为致使课程改革的前期理论储备欠缺,另一方面来自功利主义的课程研究立场,很少追问课程现象背后的真实“意义”。但,“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或我们应该做什么,而在于我们所意愿和所做背后发生了什么。”^②由此,用文化的理论与方法论探究课程的本质及实现逻辑应该是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从课程改革的轰轰烈烈到课程改革的步履维艰,它昭示了课程改革的复杂性

① 黄忠敬. 知识·权力·控制——基础教育课程文化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2:23.

② [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M]. 洪汉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1.

和课程研究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只关注课程本身的开发很难解决课程的根本问题,将其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中才是课程研究和课程改革的出路。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我认为今天以后,研究学问,就应该拿文化的眼光来研究。每种学问都是文化中间的一部分。在文化体系中,它所占的地位亦就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课程与文化的关系来看,一方面,文化造就了课程,文化作为课程的母体决定了课程的文化品性,并为课程设定了基本的逻辑规则及范畴来源,抛开文化,课程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课程又精炼、形成着文化,课程作为文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或媒体,为文化的增值与创新提供核心机制,离开课程,文化便成为一池死水而终将枯竭。^①也就是说,一方面,课程记录并反映着文化,是学校教育的传播媒介,承载着所教授的对象知识;另一方面,课程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范式中的一部分,塑造着社会文化的品性,并实现着对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

应该说,相关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具有一定共性的认识框架,即课程专家与相应的课程工作者都将课程作为文化的媒介和工具来看待,认为课程是社会文化的反映,承载和传递着社会文化,学校的职责就是传递承载社会文化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取得课程的文化工具性的“共识”,是对课程文化的事实研究。课程作为一门“属人领域”,它不仅受客观规律的支配,还受价值法则的制约,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以在任何课程问题中,既有事实因素,也有价值因素,而且往往后者更重要。一些表面看似事实的课程问题,内在地却包含着价值的前提,体现着价值的追求。研究课程文化无疑需要对价值的关注,认识和诠释文化背后的实在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重要的“范式转换”致使了课程研究范式的转换,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它标志着课程研究重心的转移:文化转向。^②“课程理解范式”将课程作为一个多元的“文本”进行研究与解读,从不同的学科背景(不同的视域)理解课程和建构课程的意义。在此背景下,把课程理解为

① 郝德永. 课程与文化:一个后现代的检视[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1.

② 黄忠敬. 知识·权力·控制——基础教育课程文化研究[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17.

政治文本的系统努力在课程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① 课程的中立性被打破,确立了课程的政治性品格。课程在社会关系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再生产了社会阶层,而且是通过相应的权力来实现的。并且,这种研究并不局限于常识性的政治概念,而是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如新课程社会学、激进的或批判性的课程理论、政治取向的课程理论等)拓展课程政治研究的范围,超越了狭隘的课程政治学研究。也就是说,人们开始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利用关系思维来揭示反映课程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阐明产生于课程领域内的程度不同的不公平现象,并揭露其符号权力的隐性运作机制和原理。进一步说,课程的价值研究成为课程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也为课程文化的价值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研究取向,从文化权力来研究课程也会促成课程研究范式的转换,并可为课程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基础。

文化学本身的发展,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如文化社会学、文化政治学、文化人类学、文化经济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使文化越来越成为“显学”,成为各门学科关注的对象。随着与课程密切相关的知识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和课程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其研究成果、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为课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方法和理论阐释框架。人们对课程问题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课程本身,也不再局限于教育本身,而是将其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与现实需求的视域中进行解读,课程文化的工具性也受到了挑战,人们需要尝试对课程这种特殊的文化进行多方的诠释,从不同的学科视野给出不同的答案。特别是文化社会学对记录文化的研究、对文化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注,使得课程学者开始从文化的另一面来研究课程文化、研究其意识形态性以及内隐的符号权力运作机制,对课程文化的事实关注转向对课程文化的价值关注。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也译成“布尔迪厄”“布尔迪约”或“布丢”,本书采用布迪厄这种译法)的文化社会学是关于权力的社会学,是对文化的意识形态展开犀利批判的社会学,摒弃宏观权力的研究路线,反对把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对立起来,而强调二者之间的一种转换生成性关系,着重于微观权力的分析,揭示不同主体活动场域的内隐的符号权力。其教育社会学(文化社会学是其直接的理论来源)研究,将课程看作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资本与权力

① [美]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帕特里克·斯莱特里,彼得·M.陶伯曼.理解课程(上)[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237.

的天然链接造就了课程领域不平等的再生产,是意识形态的反映。课程的形成、课程的流通、课程的消费(也即学生对课程知识的获取)与课程的评价等运作阶段都反映了符号权力的隐性控制,体现了统治主体的一种软性暴力统治,并与硬性暴力统治相辅相成,共同实现其意识形态控制。这也正是本书重要的研究任务,揭示课程的意识形态性与其隐性的符号权力控制,从另一个视角来揭示课程的本质,探讨课程的事实与价值问题。

西方课程研究的传统以及我国现今的课程研究主要是“工艺学模式”(Technological Model),它所关心的是学科的逻辑学和知识建构的心理学问题,是一种科学主义的编制哲学,强调技术、效率,忽视社会结构、师生互动对课程的影响,忽视课程在人类复杂的行为中所扮演的伦理角色,以及在分配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中所占的重要地位。^①这种研究范式不能确切地显示出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结构之中的教育的复杂性、课程知识的复杂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科结构运动”,60年代末施瓦布(Joseph J. Schwab)提出的“实践性课程”,以及70年代以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和罗杰斯(Carl R. Rogers)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教育家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兴起,为超越课程研究的工艺学模式做出了贡献,但这些都未将课程研究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经济背景之下,也没有用相关的学科发展理论从多维的角度解构与建构课程。人类思维向关系性复杂思维的转向以及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需要用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来阐释课程,需要有新的关注对象、理论基础、研究视角、研究主体、价值功用、研究方法,来构建多样的“课程话语”。

对课程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可以使课程理论获得一种新的学科支持。目前,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课程论的理论建设,还是作为学理层面的课程理论研究,都在课程文化属性问题上存在诸多问题,这其中既有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也有该学科相对薄弱的自身理论积淀问题,但主要是对相关方法论的应用及对相关基础学科的借鉴缺乏平衡性和学科改造性。因此,借鉴这些相关学科的理论成果,从另一个视角透视课程文化问题会对课程文化的本质、生成、选择、传递与获取等问题有更合理的理解和阐释。“教育学理论不仅属于技术的,也属于文化的、意识形态的以及政治的。如果它要产生什么影响,它一定包含着一切。”^②简而言之,本

① 吴永军. 课程社会学[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

② [美]布鲁纳. 布鲁纳教育论著选[M]. 邵瑞珍,张渭城等译.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373.

书最重要的研究意义就在于从文化社会学出发,运用相对成熟的文化资本理论框架,以及整体论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对课程进行了意识形态诠释,有助于丰富课程理论研究,对构建课程论的学科理论体系具有重要价值。

二、立论基础

本书的假设在于将课程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文化资本所表现出来的内涵与特质滋养了课程的本质内涵,课程运作是基于文化资本理念下的一种理性诠释。文化资本理论属于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畴,并获得文化社会学的学科支撑。文化社会学的发展现状及其核心框架是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支柱,并成为文化资本理论发展的向标。由此,对文化社会学有一个基本认识,并厘清其核心框架是本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石。

(一) 文化社会学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

文化社会学的学科形成的历史并不悠久,其发展总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结构至上的文化社会学研究;二是转向记录文化研究的“新”文化社会学。自社会学诞生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便是社会学的核心命题和话题,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更是如此。不过,长期以来,文化只是社会学研究的边缘性问题,社会学家对社会结构的重视远远高于对文化的研究,社会结构决定文化取向是其基本旨趣。马克斯·韦伯有关宗教价值观对社会和经济制度影响的社会学研究、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研究、迪尔凯姆对宗教的研究^①等都不约而同地将文化置于社会结构之中去研究,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从属部分。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认为文化便是意识形态),把对文化传播的控制看作一种权力的形式(社会结构靠权力,但也靠观念来维持)。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功能主义者还是强调结构对于文化信念的影响;冲突理论(时常以功能主义的对立面出现)也同样倾向于把社会结构放在优先地位。这些状况是由社会学学科的长期设想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有不同的阶级或占有不同的地位;根据一些明显的共同社会属性,人们在利益、态度和行为方面会产生系统性的差异;换言之,社会属性以特殊的方式——通常是从社会阶级上去认定——聚集成形,致使人们

^① 与韦伯主义者相类似,对于迪尔凯姆主义者来说,宗教同样是文化的一个核心成分。

在选举行为、消费习惯、养育子女等方面都呈现出阶级或地位上的差异,并且可为人所预测。^①也就是说,人们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其文化取向(也即相应的意识形态),有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就有该社会结构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等。结构居于主导地位,文化与结构具有一致性。按照阿切尔(Archer, Margaret S.)的说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不起眼的配角。”^②这些从经典社会学理论和经典人类学出发来看待文化的观点,是一种精英的霸权文化取向。尼尔·斯梅尔塞(Neil J. Smelser)在《文化理论》一书的导言部分系统地考察了过去一百年里主要经典社会学理论和文化人类学对有关文化这一范畴的阐述。他发现,在这些理论中,都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中所有人或这些人口中的亚群体(如亚文化、反文化、市民文化等)所共享的,通常是不言而喻的价值观、规范、信仰和态度。^③他们都强调统治阶级对从属阶级实施的强制或灌输的绝对文化支配,强制灌输具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强调文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文化整合、文化适应、统治文化的建构及维护是其主要研究对象。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文化社会学经历了实质性的“再造”,一直到90年代初,学科的整体转型才得以完成。“新”文化社会学不是一个单独的领域,相反,它由一系列性质不同的、独立的亚领域所组成,如科学、知识、宗教、媒体、大众文化、艺术,以及从文化着眼对诸如历史、政治、组织、分层、人际行为等等的研究。^④随着当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正变得异常复杂,社会阶层相互流动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可预测性,稳定的结构不可能持续很久,文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也就失去了它的意蕴,因为文化日益多样化,文化连贯性的缺乏或者说“文化联结的松弛”现象已引人注目。那种作为所有人口或绝大多数人口所共享的态度、价值观和信仰的文化,只是一种意义的符号载体,在众多的论述中,没有指出这些“符号载体”的落实点,是一种对非记录文化的研究。但是,在当代社会,这样只强调含蓄的文化是不够的。今天的文化几乎全部都体现

① [美]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 蒲隆, 任晓晋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83.

② Archer, Margaret S.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

③ Smelser, Neil J. *Culture: coherent or incoherent* [A]. In: R. Munch and N.J. Smelser (eds), *Theory of Culture* [C].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④ [美]戴安娜·克兰. 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M]. 王小章, 郑震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1.

和构成于作为明确的社会建构或社会产品的文化,换言之,体现和构成于记录在印刷物、胶片、人造物或者最近的电子媒介上的记录的文化(Recorded Culture)。而“新”文化社会学主要就是研究论述诸如信息、娱乐、科学、技术、法律、教育、艺术等各种不同类型的记录文化。如果不分析记录文化的内容和影响以及影响记录文化内容的各种因素,我们就不能理解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作用。^①

实际上,文化社会学的转向要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观的转型,大量其他学科和欧洲社会理论的观点促使了文化社会学观点的创新,前者如人类学、历史学、政治科学、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女性主义研究以及种族研究等;后者如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理论、英国文化研究小组等。尤其是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等法国理论极大地激发了学者对记录文化的兴趣。这些理论所关注的是文本塑造人类行为以及被精英们用作权力资源的方式。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理论是典型的例子。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是将文化与权力有力结合研究的又一例证,他认为记录文化所负载的知识是维护社会地位和社会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准,是社会分层的一种隐性的符号权力工具,并拓展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新方向——作为符号权力的文化研究。这些后现代理论对记录文化的重视,提高了文化在社会学中的地位,使得新文化社会学者在肯定记录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的一致性、连贯性、整合性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虚构或意识形态。^②由此,关注如传媒、知识、科学等的社会建构,以及这些记录文化建构诸如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角色的方式(葛兰西将这些不同个体和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方式和世界观称作为意识形态),揭露作为“符号载体”的文化的特定群体的权力工具性质便成为新文化社会学者的重任。这也符合文化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就一个文化现象的发生环境来寻根求源。^③

(二) 新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及其相关理论

文化社会学的转向确立了研究记录文化的重要地位,其中,布迪厄的文化研究是文化社会学转型的一个标志,将传统对狭隘单一的大写文化的研究扩展到能

① [美]戴安娜·克兰. 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M]. 王小章,郑震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② 冯婷. 逸出结构的文化——文化社会学的新发展[J]. 学术论坛,2001(4):124-127.

③ 张宝明. “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J]. 学术界,2005(2):68-78.

施行人类学分析的小写的复数文化,其核心任务便是要分析文化象征领域与社会空间的结构对应,超越了传统关于文化相对独立的论述,将各种文化实践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运作紧密结合,认为其存在于社会变迁与历史转型过程中,而且文化一直是生产和再生产社会等级结构的重要的隐蔽力量,文化便是一种权力。其研究对象与成果直接指向教育,以及教育的中心媒介——课程。在场域(Field)—惯习(Habitus)—资本(Capital)的三位一体概念框架下,系统阐释了学校教育系统的文化特权再生产机制,以及符号权力在文化再生产和意识形态再生产上的隐蔽机制,本书便是基于布迪厄的新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来对课程做出的一定阐释。

1. 理论框架

场域、惯习和资本是布迪厄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基于整体主义和关系主义的方法论,为解释文化再生产和揭示符号权力的运作机制提供了实践的落脚点。

在布迪厄看来,“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①。这些“社会小世界”便是各种不同的“场域”,如学术场域、经济场域、政治场域、艺术场域、教育场域等;这些相对小的场域既相互独立,也相互联系,构成社会这个“大场域”。场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布迪厄从关系主义思维出发,认为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的系统,而不是实体系统,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者一个“构型”,^②而且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③由此,场域还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这在于每一个场域都有值得获取的“利益”,当然这种利益不仅仅是指经济利益。在不同的场域中有不同的利益,学术场域中的利益是获取学术地位,政治场域中的利益是获取政治资本(也即较高的官位)。同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4.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4.

③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55.

时,不同的场域还有自身的边界,都确立了进入场域的标准,尽管很多时候都是隐性的,但都是经过制度化而确认的。

“场域”和“惯习”(也被许多学者译为“习性”)是一对共生的概念。场域里的行动者是有知觉、有意识、有精神属性的人,不是物质世界,有自身的一套性情倾向系统,或者说,惯习是场域存在的基本条件和精神支柱。何谓惯习?“与存在条件的特定阶级相联系的条件作用形成了惯习:它是持久的、可变换的一些性情系统,是一些被建构的结构,这些结构倾向于作为建构型结构而起作用,也就是作为这样一些原则而起作用:它们产生和组织了实践和表征,从而,即便并未有意识瞄准一些目标,或者并未明确掌握为达至这些目标必备的运作程序,就可以客观地适应到其结构中去。”^① 其特点主要有:第一,它是一种认知与行动的图式系统。第二,惯习的稳定性特征,内化于身体内部的惯习会超越一些具体情景而发生惯性作用。第三,惯习的能动性特征,在某个场域获得的惯习可以在其他场域发生类似的效果。第四,惯习的开放性特征,在一些社会条件的作用下,惯习可以发生一些变化。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②。第五,惯习通常在无意识层面上发生作用,是一种内控性的实践活动。场域和惯习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首先,场域和惯习是相互交织的双重存在,场域是具有惯习的场域,没有惯习的场域是不存在的;惯习是场域的惯习,脱离场域的惯习也是不存在的。^③ 其次,场域内部,场域和惯习之间有着“本体论的对应关系”。场域形成特定的惯习,惯习赋予场域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建立一种认知间的关系。再次,不同场域与惯习之间的不兼容性,这是由其“本体论的对应关系”决定的。最后,场域与惯习的关系是一种以“实践”为中介的“生成”与“建构”的关系,而不是一种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

场域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空间,对利益的争夺实际上是对资本的争夺。由此,离开了资本,就无法准确地表述场域的存在价值。个体在场域中的位置是由其自身的资本占有量决定的,不同资本的类型决定了该场域的特性。另外,“资本”离

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71.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 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 李猛,李康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78.

③ 张国举.“场域——惯习”论:创新机制研究的新工具[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5(3):32-35.